

台湾问题：中美互动的新常态

吴心伯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副主任

【关键词】台湾问题、中美互动、新常态

【摘要】近年来，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形成了新的互动态势。两国在维持台海现状方面形成了共识，都认为台独势力谋求“法理台独”是对台海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挑战，并为维护台海稳定展开了积极互动。中美在台海问题上的积极互动是两国利益博弈的结果。在可预见的将来，出于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和台海地区稳定的需要，中美两国有望继续保持在台湾问题上的正面互动态势。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06) 5期 0006-08

【完稿日期】2006年7月19日

冷战结束以后，由于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台湾岛内政治的变化和“台独”分裂势力的抬头，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重新凸显。新世纪之初，台海局势一度十分紧张，中美关系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然而，在经过大陆、台湾和美国的三边互动、中美两国的政策调整以及台湾政治生态的重新洗牌之后，两岸关系出现了转机，台海局势渐趋稳定，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也形成了新的互动态势。

变化与调整

新世纪初，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经历了一条由“山穷水复”到“柳暗花明”的发展曲线。在2000—2001年间，两种力量形成的合力挑战着台海现状，威胁着台海局势的稳定。首先，代表“台独”分裂势力的民进党在2000年的台湾选举

中上台，意味着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半个世纪以来台湾当局对“一个中国”的认同不复存在，“台独”分裂路线主导了台湾的两岸政策。虽然陈水扁上台之初做出了“四不一没有”的承诺，^[1]但实际上奉行的是“渐进台独”路线，通过“小步快跑”的策略推进台独议程。陈水扁的“台独”冒险挑战着两岸关系的底线，迫使中国大陆将反“台独”列入处理两岸关系的当务之急。其次，小布什在2001年初入主白宫，这届政府深受共和党右翼和新保守派的影响，奉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和极端亲台政策。布什政府将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将中国谋求国家统一的努力视为对亚太地区现状和美国在此地区重大利益的挑战，通过大力支持台湾来阻止中国“改变现状”。布什政府在2001年4月宣布了一笔高达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其中包括8艘柴油动力潜

艇，这打破了美国自中美建交以来只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惯例。布什甚至公开宣称美国要“竭尽所能协防台湾”，从而突破了1979年以来美国在台海冲突上一直保持的“战略模糊”。布什政府还大力提升美台政治关系，积极推进美台军事合作。此外，布什政府还试图淡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个中国”立场，转而强调“和平解决”两岸分歧。布什此举是要加大对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牵制，但同时也向岛内的台独势力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他们的台独冒险路线将得到美国的无条件支持。^[2] 布什政府的这些举措动摇着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形成的既定框架，台湾问题再次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严重障碍。2002年3月16日，在发生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赴美参加“美台防卫峰会”并与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等高级官员会面的事件后，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就台湾问题向美方发出了措辞强烈的抗议：“台湾问题这个包袱美国已经背了半个多世纪，继续背下去没什么好处，还可能落得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下场。美方最好认清历史大势，放弃把台湾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的政策，停止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3]

形势比人强。“9·11”事件的发生、朝鲜核问题的重新浮现以及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对美外交斗争，促使布什政府回调对台政策。2002年5月，美国副总统切尼在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时表示，美国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独”势力的发展。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也在5月底的一次记者吹风会上表示：“我们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他还特别强调：“（美国）没有让台湾从（中国）大陆分离出去的想法，也没有让台湾独立的意图和愿望。”^[4] 8月，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发表“一边一国”言论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重申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10月，江泽民访美期间，布什亲口承诺美将“反对台湾独立”。这是布什第一次在台湾问题上做此表态。2003年9月，陈水扁为配合台湾大选

提出三阶段谋求“台独”的时间表，并决定就两岸问题举行“公投”，中国领导人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制止“台独”，两岸关系骤然紧张。美国国务院表示，反对台湾举行任何旨在改变其地位或迈向独立的公民投票，并敦促陈水扁恪守“四不一没有”的承诺，不改变台湾现状。布什还派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莫健作为特使赴台向陈水扁施加压力，在劝说无效后，布什总统在2003年12月欢迎访美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时公开表示：“美国反对中国或台湾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台湾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可能想做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决定，对此我们是反对的。”^[5] 这是布什执政后向陈水扁政府发表的措词最为激烈的警告。在美方的压力下，陈水扁虽执意举行“公投”，却不得不调整公投的内容，舍弃其中挑衅性的成分，而且由于参加“公投”者未达到选民的半数，这次公投无效。

随着陈水扁在2004年的台湾领导人选举中可疑地获胜，他在第二任期内谋求“法理台独”的可能性增大，布什政府也以更加明确的言辞向陈水扁发出忠告和警告。2004年4月，布什政府利用助理国务卿凯利在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的机会向台湾方面完整而清晰地阐明了美国对台政策。凯利在证词中指出，美国支持台湾民主，但不支持台湾独立；在台湾考虑对其宪法做可能的修改时，美国的支持是有限的；中国大陆表示台湾问题关系其核心国家利益，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将诉诸武力，无论对美国还是台湾领导人来说，若视这些声明为虚言恫吓，那将是不负责任的。^[6] 2004年10月，鲍威尔国务卿在北京之行中公开强调，“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不是独立的。它没有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主权，这继续是我国的政策，是我们坚决奉行的政策”。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也在今年12月表示，《台湾关系法》只要求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维持足够的兵力以慑阻中国大陆攻打台湾，但没有要求美国保卫台湾。^[7] 分析人士认为，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在台湾“立法院”选举前接连放出“重话”，对“台独”进行打压，这对“泛蓝”在选举中夺回多数席位起到了积极作用。^[8] 2005年6月8日，布

什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被问及如果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美国是否协防台湾,布什答称:“如果中国大陆单方面入侵,我们会根据《台湾关系法》的精神采取行动。如果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那将是一个单方面的决定,将会改变美国的平衡立场。”^[9] 2006年初陈水扁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违背了他做出的“四不一没有”的承诺,美国对陈水扁的疑虑上升,认为陈的政治信用出了问题。为表示对陈水扁的不快,在2006年5月陈水扁到中美洲活动需要过境美国时,布什政府只同意陈来回在阿拉斯加作短暂停留,不允许其到美国本土活动,这是陈水扁上台以来在过境美国待遇中最差的一次。陈水扁恼羞成怒,破天荒地决定往返均不过境美国。与此同时,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5月10日在国会作证时还就陈水扁的“台独”图谋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评论。佐利克表示,美国一方面要对台湾给予支持,同时又不鼓励企图寻求台湾独立的人,因为“台独”就意味着战争,而这又意味着美国士兵可能会因此丧生。佐利克还直言不讳地对陈水扁在“废统”问题上的做法表示不满。他指出,陈水扁向美国承诺过“四不一没有”,但后来的发展是,台湾方面想办法侵蚀这一承诺。“当某些政治人物出于政治竞争需要而改变或收回承诺,或用可能导致冲突的方式强行进逼底线时,美国政府就会有反应。”佐利克还提醒说,如果台湾当局不断试图挑战美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定调的一个中国政策,“我认为他们一直在撞墙!”^[10]至此,布什政府向陈水扁传递的信息已清楚无误: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台湾不要在“台独”路线上走得太远。

促使布什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政策调整的因素来自两方面。首先是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的重新认识。从2001年夏天起,布什政府开始摆脱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简单化的观点,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有了新的认知。“9·11”事件的发生和朝鲜核问题的重新凸显更使布什政府认识到,中国不是美国不可避免的敌人,而是在反恐战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的合作伙伴。^[11] 随着时间的推移,布什政府特

别是布什总统本人对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意愿在上升,对台湾问题的处理也越来越注意到中美关系的大局。另一方面,陈水扁的“台独”行为也不断挑战美国利益,迫使布什政府不断做出反应。当华盛顿专注于反恐、伊拉克和朝核问题之际,陈水扁不断推进台独议程,制造台海紧张,不可避免会干扰美国的外交与安全议程。更重要的是,随着陈水扁试图推进“法理台独”,他也在挑战两岸关系的底线,美国被卷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的风险也在增大。尽管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对台湾承担了安全义务,但在中国军事力量不断壮大的形势下,美国为“台独”而战的意愿是很低的。

当布什政府不断调整其对台政策立场时,台湾两岸的形势也在发生变化。从2004年底起,台湾岛内政局的积极变化使“台独”势力不断膨胀的势头受到遏制。2004年12月,在台湾岛内“立法院”选举中,以国民党和亲民党为代表的“泛蓝”阵营赢得多数席位。由于“泛蓝”阵营在两岸关系上主张“一个中国”、维持现状、反对“台独”,“泛蓝”在台湾“立法院”的优势地位有助于牵制陈水扁谋求“法理台独”的政治冒险。2005年底,在台湾县市长选举中,“泛蓝”获得压倒性胜利,这使得台湾的政治生态进一步摆脱民进党“绿化”的态势。与此同时,国民党中生代代表人物马英九当选为国民党主席,有助于重新塑造这个大老党的政治形象,恢复国民党的活力,从而更有效地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与民进党抗衡。

在中国大陆方面,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领导集体也在对台问题上进行了重要的策略调整,“硬的一手更硬,软的一手更软”,处理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也更加务实、灵活。首先,针对陈水扁连任后有可能推进“法理台独”的动向,全国人大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以法律的形式界定了中国大陆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和对付“台独”的终极手段。该法第8条规定:“‘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

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毫无疑问,《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加强了对“台独”活动的威慑。其次,加大对台湾岛内工作的力度。2005年,台湾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连战应胡锦涛总书记的邀请对大陆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亲民党和新党领导人也率团来访,他们与大陆领导人达成了一系列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共识,展示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巨大空间。这一系列积极互动有助于使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形成更加务实和理性的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台独”势力推行挑衅性和对抗性的两岸政策的政治基础。第三,向美国方面明确提出共同遏制“台独”的主张。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插手台湾问题是导致这一问题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因此,长期以来,中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美国应该停止插手台湾问题,不干涉中国内政。然而,现实地看,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短期内难以放弃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另一方面,“台独”冒险活动也在冲击着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统不独”的底线,迫使布什政府不断向陈水扁政府发出警告。这意味着中美在近期内有可能在制止“台独”上找到共同利益,实现一定程度的合作。2005年9月13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纽约与美国总统布什会晤时,向对方介绍了中国大陆为缓和台海紧张局势所采取的步骤,希望美方理解和支持中方为改善两岸关系、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所做的积极努力。9月20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纽约会见美国国务卿赖斯时表示:“中方赞赏布什总统与胡锦涛主席在纽约会晤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希望美方恪守承诺,与中方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大局。”^[12]从反对美国插手台湾问题到呼吁美国与中方一道制止“台独”,这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一个重要的策略调整。

中美互动的新格局

在此背景下,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形成了新的互动格局。首先,维持台海现状成为中美之间的共识。对中国来说,统一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终

目标,但在现阶段和平统一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而“台独”势力又急于改变台海现状,谋求实现台湾“法理独立”,这样制止“台独”、维持台海现状就成为当前对台政策的当务之急。对美国而言,台湾独立也许是最优选择,但由于支持“台独”的风险太大,美国只能退而求其次,维持两岸“不统不独”的局面,这样美国付出的代价最小,而收益最大。对中美双方而言,这都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转变。在中国方面,由20世纪80-90年代致力于“促统”到21世纪初致力于“防独”,是决策者面对变化的客观形势所做出的恰如其分的调整。在美国方面,在布什执政之初,“以台制华”的倾向极为明显,华盛顿在某种程度上默许甚至怂恿台湾当局以“渐进台独”的方式改变现状。但是随着美国对“台独”活动的严重后果的认识的加深,美国的立场开始调整,而中国大陆《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更使华盛顿明了其台海政策的底线所在。李光耀认为,中国全国人大在没有任何反对票的情况下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以后,“台湾一旦独立,大陆会不会动武已经没有悬念。由于美国不想卷入这场对它没有好处的战争,因此它接下来将会确保台海继续维持现状。”^[13]这样,虽然中美双方在台海问题上的根本利益不同、最终目标不同,但在现阶段,维持现状是他们的政策交集点。其次,中美双方都认为陈水扁推进“法理台独”是对台海和平的主要挑战。2006年2月,在陈水扁决定终止“国统会”运作和“国统纲领”适用后,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表声明指出,“当前陈水扁通过‘宪改’进行‘台湾法理独立’活动的冒险性、危险性继续上升,一旦得逞,势必造成两岸关系高度紧张,严重威胁台海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坚决反对和制止陈水扁通过‘宪改’进行‘台湾法理独立’活动,是当前我们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14]2006年4月,布什总统在同到访的胡锦涛主席会谈时也表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理解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关切,不希望看到台湾当局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动损害中美关系。”^[15]在佐利克发表前述针对陈水扁“台独”行为的讲话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

办事处处长杨苏棣在台湾公开表示,台湾人民对宪政体制正在进行辩论,美国表示尊重,不过,受限于东亚安全环境,台湾的修宪论述应以更谨慎的态度面对,不要触碰台独方面的议题,“否则会引起美国的关切”。^[16]

从2003年应对陈水扁就两岸问题举行“公投”开始,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形成了积极互动的态势。在陈水扁提出“公投”计划后,中国方面适时向美方表达了关切,并要求美方制止陈水扁的挑衅行为。11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访美前接受《华盛顿邮报》总编采访时告诉对方:“我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注意到台湾当局领导人破坏国家统一的严峻性和危险性,不要向他们发出错误信号,应该采取有助于台海和平与稳定的实际行动”。^[17]一周后,布什派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莫健携带他的亲笔信赴台向陈水扁施加压力,试图劝阻陈水扁的“公投”挑衅行为,莫健随后还赴北京与中方沟通。在劝阻陈水扁无效后,美方决定加大对陈的压力,布什总统遂在2003年12月欢迎来访的温家宝总理的仪式上公开批评了陈水扁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举动。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出台前,中方与美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中国外交部常务副外长戴秉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陈云林先后赴美,向美方通报中方制定这一重要法律的基本考虑和该法案的主要精神。美方欢迎中方主动就这一敏感议题与其沟通,认为此举是有帮助的,同时美方也通过各种渠道向中方表达了其对该法案的关切,特别是希望不要将“一国两制”写入该法,这一意见受到中方重视。^[18]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认为,中美就《反分裂国家法》“在不同层次上保持了交流和沟通”,“这对双方在《反分裂国家法》问题上增进了解是有益的”。^[19]由于中美在该问题上的有效沟通,《反分裂国家法》出台后,美国的反应比较低调,华盛顿还告诫台湾当局,不可反应过度,以免引发台海局势新一轮紧张。2006年初,在陈水扁着手“废统”之际,中方向美方表达了对陈水扁此举的担忧,希望美方采取行动阻止陈水扁的挑衅行为。美方也确实通过各种渠道

对陈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包括派遣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韦德宁、国务院台湾事务科长夏千福在2月中旬秘密访台,向陈水扁传达美国“严重关切、无法接受、不予支持”的立场。^[20]在陈水扁宣布“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后,美国国务院随即发表了措辞强烈的书面声明,要求台湾当局公开确认没有废除“国统会”,并未改变台海现状,且确认相关保证仍然有效;声明还指出,如果废止其中任何一项保证,就是改变现状。^[21]

中美在台海问题上的积极互动是两国利益博弈的结果。对中方来说,由于美方对台湾拥有重要的影响力,同时美方又不希望陈水扁急剧改变台海现状而引发将美方卷入其中的冲突,因此适度借用美国的影响力来牵制“台独”是一项可行的策略。对美方来说,由于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的牵制,美方不希望台海局势再趋向紧张,同时美方也要寻求中方在处理上述问题上的合作,因而愿意对陈水扁谋求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予以一定的制约。胡锦涛主席2006年4月访美期间,在与布什总统的会谈中指出,“中美在反对和遏制‘台独’、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方面有共同战略利益。”^[22]这是中方对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形成的新的互动格局的判断和企盼。在可预见的将来,出于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和台海地区稳定的需要,中美两国有望继续保持台湾问题上的正面互动态势。

当然,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互动的新格局还是比较脆弱的。这首先是由于双方的最终目标和利益需要不同。中方要实现国家的最终统一,而美方更愿意看到台海保持实际的分离状态,^[23]华盛顿还不时在对华关系上打台湾牌,并且把台湾作为在战略上牵制中国的一个砝码。这意味着美国对“台独”的制约是有限的。事实上,美国不会反对台湾实质性的独立,而是反对台湾正式的、法理的独立,反对的是那些具有高度象征性、宣示性,同时又对大陆具有极大的刺激性的“台独”举措。其次,由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根本利益的不同和美国国内强大的亲台势力的存在,美国行政当局还要极力避免被亲台势力指责为“与中国联手对付台湾”,因此在制约“台独”时,美国不会完全按照中国的意愿

行事,而更多地根据自己的利益考虑独立地处理台湾问题。^[24]美国在处理陈水扁“废统”问题上“先紧后松”、“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的处理方式就说明了这一点。^[25]此外,中美尽管在现阶段都希望维持台海现状,但对现状的认知却不尽相同。中方对现状的界定是法理上的,即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从法理上看,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就是对现状的界定;美方对现状的定义既包括两岸分离的现状(即台湾事实上的独立),也包括台湾尚未获得法理独立、不具备主权身份的事实。^[26]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在宣示两岸不得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时,强调这个现状是美方定义的现状,其意乃是要保持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话语权和主动权。针对美方的这一企图,中方明确表示,现状不由美方界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是台湾的全部历史和现状”。^[27]中美对台海现状认知的差异不可避免会妨碍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正面互动。

美国对台政策走向

影响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互动的因素很多,但美国对台政策是关键。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形成了处理台湾问题的既定框架,用美国官方的话说,这个框架是由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所界定的。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时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对台政策框架也受到冲击,有过摇摆,但大体上维持着原有结构。与此同时,美国对台政策的具体内容则因环境的变化而进行了调整。这些调整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始,在小布什执政的几年里加快了步伐。从正面看,针对“台独”分裂势力越来越猖獗的现实,美国愈来愈明确地表明“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布什总统在同中国领导人会晤时则多次用了“反对‘台独’”的措辞)。在经济上,美国敦促台湾方面加强与大陆的经贸联系,开放“三通”。鉴于台湾当局以担心台湾经济上过分依赖大陆和岛内产业空心化为借口拒不开放“三通”,布什政府强调,台湾应从全球相互依存的更宽广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28]从负

面看,美国不断扩大对台军售,加强与台湾的军事联系,以牵制大陆对“台独”势力的军事威慑;积极支持台湾扩大所谓“国际生存空间”,为台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提供便利;吹捧台湾民主,以凸现对台湾的政治支持和向中国大陆施加压力;考虑与台湾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以平衡台湾对大陆日益上升的经济依赖,等等。由此可见,美国对台政策在基本框架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其侧重点和具体内容会因时因势而变,这种变化既是对台湾问题内外环境演变的反应,更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利益为依归。

那么,美国对台政策将如何演变?近年来,鉴于台湾岛内局势的变化,一些美国人士就美国对台政策走向展开了讨论,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第一种看法认为,美国应维持“双重遏制”的政策,一方面要继续阻止大陆动武,同时也要防止台湾走向正式独立。第二种看法认为,美国在台海地区的利益是和平与稳定,而“台独”势力的发展已对此构成挑战,因此美国应将政策重点转向制约“台独”。第三种看法主张美国应致力于为台海两岸的良性互动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包括推动两岸对话和实现“三通”。从布什政府的政策行为和主流派专家学者的意见来看,美国的对台政策仍将延续“双重遏制”的套路。美国将越来越多地通过政治手段牵制台湾走向“急独”或“法理台独”,同时继续在军事上牵制中国大陆对台军事威慑。美国对台海两岸的“双重遏制”既可以平行推进,也会因时因事有所侧重。此外,正如某些有影响的美国学者所建议的那样,美国在对台海两岸实施不同形式的“遏制”时,也会注重释放不同内容的“安抚”信息,以实现美国台海政策的最佳效果。对北京,华盛顿要强调的是美国无意支持台湾独立;对台北,华盛顿则强调美国不会为了同北京发展关系而牺牲台湾的利益。^[29]在推行“双重遏制”的同时,美国也会继续表态支持两岸对话,扩大经济、人员交流,包括实现“三通”,但这不会是美国两岸政策的重点。

长远而言,美国对台政策的走向将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二是中美利益互动关系的变化。可以预计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

的上升和国防现代化的推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对抗的代价会越来越高,为台独而战的意愿会不断下降。美国凯托研究所的特德·卡彭特认为,随着“台独”势力积极推进“台独”议程,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在增大,美国不应该为了台湾的“独立”而卷入一场同中国的战争。在此情况下,美国对台政策应做出如下调整:首先,美国阐明其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台独”的立场;其次,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第三,告诉台湾方面,独立与否,由他们自己决定,但如选择独立,他们必须准备自己承担一切后果。^[30]虽然卡彭特为美国对台政策开的药方在美国政策精英中和者甚寡,但支撑其政策主张的基本逻辑——美国不应该为了台湾的“独立”而卷入一场同中国的战争——正在为越来越多的美国有识之士所认同。^[31]这一重要认知既界定了美国对台安全承诺的限度,明晰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底线,也为将来美国对台政策做可能的调整埋下了伏笔。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扩大也会改变美国思考台湾问题的角度。美国传统的“以台制华”政策主要是基于中美之间力量均势的考虑,但在相互依存越来越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特征背景下,台湾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地位和价值势必发生变化。美国未来学学者托马斯·巴奈特认为,由于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大国,美国应放弃台湾,同中国结成“战略军事同盟”。巴奈特从全球化的角度看问题,认为形成中的新的世界体系的支柱是一系列“功能核心”国家,包括西方国家以及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所谓新兴的大国。要最大程度地确保美国的安全和影响,美国必须扩大“核心”国家范围,增加它们之间的合作。美国应该与中国结盟,在亚洲成立类似北约的安全组织,让中国领头。这样美国不仅可以将在亚洲的军事力量抽调到中东和非洲,也可以同中国在中东和非洲进行军事合作。巴奈特强调,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仍保留战略模糊的话,“将会让台北在它自己挑选的时间,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引发中美战争。这将极大地威胁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长期战略利益。”^[32]巴奈特的观点可能听起来

过于超前,但不要忘记,当年尼克松总统之所以在对华政策包括台湾问题上做出重大调整,也恰恰是因为美国在对华关系中新的利益需要所致,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中,中美战略合作的巨大利益远远大于美国继续奉行遏制中国和“以台制华”的利益。尽管冷战后由于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崩塌以及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分歧的凸现,美国对台湾的同情和支持呈上升趋势,但随着中美利益相互依存的扩大以及中美共同成为维护、协调和推进现存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者”,美国政治精英以新的思维审视对台政策是可以预期的。

注 释:

[1] 2000年5月20日,陈水扁上台未稳之时,曾作过所谓“四不一没有”的承诺,即“不会宣布‘台湾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李登辉的‘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

[2] Richard Bush,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p. 264.

[3] “李肇星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就汤曜明访美等问题提出严正交涉”。《人民日报》2002年3月17日第4版。

[4] 薛福康、李海茵:“美国警告陈水扁”。《环球时报》2002年6月3日,第1版。

[5] Brian Knowlton, “China welcomes U.S. stanc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0, 2003.

[6] James A. Kell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Overview of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Testimony at a hearing on Taiwan,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April 21, 2004.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04/31649.htm>.

[7] “Interview: Secretary of State Colin L. Powell with Anthony Yuen of Phoenix TV,” Beijing, China, October 25, 2004, <http://usinfo.state.gov/eap/Archive/2004/Oct/26-277540.html>; “Interview with Charlie Rose on PBS”, Richard L. Armitage,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DC, December 10, 2004, <http://www.state.gov/s/d/rm/39973.htm>.

[8] 李晓岗、晓静、诸砚、海碧、萧师言、谷雨:《2005年,美让‘台独’很失望》,《环球时报》2005年12月28日,第10版。

[9] Fox News: “Transcript: President Bush on ‘Your World’,” Wednesday, June 8, 2005, <http://www.foxnews.com/story/0,2933,158960,00.html>.

[10] Hearing Of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Subject: China’s Resurgence, Chaired By: Rep. Henry Hyde (R-IL), Witness: Robert B. Zoellick,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Wednesday, May 10, 2006, Transcript provided by Federal News Service, Inc., Suite

500, 1000 Vermont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05, USA.

<http://www.fnsg.com/transcript.htm?id=200605102074>

[11] Richard Bush,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p. 248.

[12] 外交部网站：“胡锦涛主席同美国总统布什会晤”，2005年9月14日，<http://www.fmprc.gov.cn/chn/wjdt/wshd/t211852.htm>；谭宏伟：“李肇星会见赖斯，望美方与中方一道维护台海稳定”，中新网纽约2005年9月20日电，<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09-21/8/629081.shtml>

[13] 孙传炜：《李贲政：台海问题转清晰有助稳定局势》，《联合早报》2005年4月2日。

[14] 国务院台办网站：“中台办国台办授权就陈水扁决定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发表声明”，2006年2月28日，http://www.gwyth.gov.cn/zywg/zywg0.asp/zywg_m_id=107.

[15] 外交部网站：“胡锦涛主席同布什总统举行会谈”，2006年4月21日，<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wt/hjtcf200604/hjtcf200604usa/t247613.htm>.

[16] 台湾《中央日报》2006年5月12日。

[17] “温家宝：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统一”，中新网2003年11月23日电。

[18] Bonnie Glaser, “Sino-U.S. Relations: Drawing Lessons from 2005.” *The Freeman Repor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nuary 2006, <http://www.csis.org/china/frn>.

[19] “2005年3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外交部网站，2005年3月3日，<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185545.htm>.

[20] 刘宏：“‘终结’：美国态度之变”，《国际先驱导报》2006年3月3日-3月9日，第8版。

[21] Press Statement, Adam Erel, Deputy Spokesman, Washington, DC, March 2, 2006, Press Statement,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06/62488.htm>.

[22] 外交部网站：“胡锦涛主席同布什总统举行会谈”，2006年4月21日，<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wt/hjtcf200604/hjtcf200604usa/t247613.htm>.

[23]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谭慎格(John Tkacik)认为,美国出于下列利益考虑,不能容忍中国大陆统一台湾。首先,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美国需要防止“大陆亚洲”控制“岛屿亚洲”。美国是全球主导性的海上力量,海上通道的安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而台湾扼守美国西海岸与东亚的主要海上通道和日本与中东的主要海上通道上。同时,美国与亚洲岛屿链的同盟关系为美国提供了侦察能力,这些能力对保护太平洋美国海军的安全十分重要,台湾是亚洲岛屿链的重要环节,如果美国不控制它,太平洋的后门就会对中国庞大而现代化的海军洞开。其次,美国与台湾有着活跃的情报交流关系,台湾与中国大陆统一将终止这一关系。第三,台湾是美国军火工业的主要买主之一,是向美国国防研发提供资金支持的重要伙伴。台湾与中国大陆统一将危及这一关系。最后,台湾拥有先进的技术基础,其中很多技术与军事工业相关,美国的政策禁止向中国出口这些技术,而台湾与中国大陆统一将导致这些技术流向大陆。

——John Tkacik, “Taiwan’s Presidential countdown: what does it mean for the United States?” http://www.jamestown.org/pubs/view/cwe_003_009_001.htm.

[24] Bonnie Glaser, “US hands-on management of cross-Strait tension,” *Asia Times*, May 15, 2004.

[25] 例如,美国方面在回应中方对其制止陈水扁“废统”不力的批评时辩解称,中国方面也没有理睬布什总统要求北京与陈水扁当局对话的建议。美国国务院负责台湾事务的官员甚至说,美国其实并不在乎“国统会”和“国统纲领”是否会被废除,美国在乎的是陈水扁的政治信用。——2006年3月24日和26日与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及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谈话。

[26] 2004年10月25日,鲍威尔国务卿在北京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发表“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不是独立的。它没有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主权,这继续是我国的政策,是我们坚决奉行的政策”的谈话后,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艾瑞里(Adam Erel)在同一天(美国东部时间)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新的突破,国务卿鲍威尔的用语精确反映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湾地位的政策。”——“美国务院称鲍威尔言论精确反映美国长期对台政策”,中新网2004年10月26日电,<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4/2004-10-26/26/498676.shtml>.

那么,美国是否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呢?1982年中美签署“8·17”公报前夕,里根政府曾向台湾作了“6条保证”,其中第5条为美国“不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立场”,但这个立场为何,美方却存在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美国将继续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至于统一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美国只坚持用和平手段实现统一;另一种解释是,美国不强迫台湾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Alan D. 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Washington DC: The Henry Stimson Center, 2003), p. 136.

[27] 施鲁佳：“台湾的现状不是由美国界定的”，新华网2004年5月30日，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4-05/30/content_1498142.htm.

[28] “Overview of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James A. Kell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Testimony at a hearing on Taiwan,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April 21, 2004.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04/31649.htm>.

[29] 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Contemporary Security Dilemma: Deterring a Taiwan Conflic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5:4 (Autumn 2002), pp. 7-21.

[30] Ted Galen Carpenter, “President Bush’s Muddled Policy on Taiwan,” *Foreign Policy Briefing* (CATO Institute), No. 82, March 15, 2004.

[31] 罗伯特·罗斯认为,华盛顿一直认为台湾独立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因为这种行动可能导致战争。——Robert S. Ross, “Taiwan’s Fading Independence Move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2, March /April 2006, p. 148.

[32] Thomas P. M. Barnett, *Blueprint for Action: A Future Worth Creating*,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2005, pp. 137-162.

PRÉCIS

On China–Japan relations

The China–Japan relations have seen certain degree of deterioration in recent years, which reflected the Political right deviation of Japan and the changes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ture tendency, fundamental changes will be difficult to take place in the Sino–Japanese political relations, while the economic relations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in the complex situation. Generally speaking, strengthening good neighborly relations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are in the basic interest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two sides should ponder rationally and handle carefully their relations to maintai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Taiwan Issue: New tendencies in the US–China interaction

In recent years, a new mod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on the Taiwan issue has taken shap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series of factors. The two countries have reached consensus on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of the Taiwan Strait. Both share the view that the So–Called ‘De Jure Taiwan Independence’ is the major challenge to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Taiwan Strait, and are carrying out active interaction in order to maintain stability. The a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on the Taiwan issue is the result of a great game around their respective interest.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two countries are most likely to maintain this mode of positive interaction on the Taiwan issue, out of the need to maintain the overall relationship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Taiwan Strait.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Deng Xiaoping made the analysis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1980s–1990s, that “there are two major strategic issues with global significance in the current world, one is the issue of peace, and the other is the issue of development. None of them have been resolved so far.” Since the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has been complicated and unstable, which is the inevitable reflection of the fact that the issues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have neither been resolved. Generally speaking,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current world is faced with three major challenges: the prevalence of the American hegemony, the ever growing negativ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ocial problems. The three challenges will have major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slamic World

The Islamic world is experiencing a new transformational period, and is faced with economic glob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in the West’s model, and the request for renovation of the Islamic culture and value itself. The essence of this transformation is self re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Islamic civilization. The reinvigoration of Islamic movement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nflicts between Islamic countri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outstanding features of this transformational period of the Islamic world.